

古徐国小史

李世源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南京

古 徐 国 小 史
李 世 源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校内)

责任编辑 陆西骋

淮阴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25 字数: 57千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305—00867—2

序 言

今日的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在商周时代曾经存在过一个徐国，或称徐方、徐夷，相传是嬴姓部落首领少昊氏的后裔。一般认为，徐夷是东夷族中势力最强的一支，她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铸造的青铜器相当精美，具有独特的风格。商代晚期，她是帝乙和帝辛时主要的征伐对象和掠夺财富的目标。西周初年，她是鲁国的劲敌之一，在周穆王时曾经称王于淮泗之上，并率东夷族人向周王室进攻，被穆王合诸侯之兵所败。春秋时，她成为齐、楚、吴三大国之间的缓冲国，不时遭到大国的征伐，终于在公元前512年，由于收留吴公子掩余触怒了吴王阖闾而被灭国，徐君率从臣奔楚。此后，徐国便从历史上消失了。

但是，一些重要的先秦古籍，如《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三传”、《荀子》、《韩非子》、《竹书纪年》、《山海经》、以及稍晚的《淮南子》、《史记》和《汉书》中，都或多或少地记载有徐人的事迹。而地下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与西周春秋青铜器上的铭文，更明确地证实了徐人的存在及其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特别是近年以来，不仅在徐人活动中心的淮泗流域，而且还在大江以南的苏南、浙江、江西和湖南、湖北等地多次发现了

具有独特风格的“徐器”，进一步说明了徐人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是相当广大的。因此，研究徐夷以至淮夷的历史状况及其与毗邻诸国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应该说也是我国先秦古国史中值得研究和探索的课题之一。

我国老一辈的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徐旭生、容庚、陈梦家先生等均曾对徐国史或徐器有所论述。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对徐国史作进一步研究，并对新出土的徐器进行考释，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将有关徐国的各种史料连缀成书者尚告阙如。今淮阴的青年学者李世源君不辞筚路蓝缕之苦，辛勤爬梳数载，得此《古徐国小史》之硕果，实为先秦史学界之幸事。

当然，由于有关徐国的史料散见多书，甚或有相互矛盾者，而学者对地下出土的徐器，每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取舍之间，颇费周折。所以，此“小史”只能作为一家之言而参加先秦史学界的争鸣园地。诸如作者论证的“虎方”即“徐方”说，徐夷、淮夷联盟说，以及徐的疆域与国都等等，均颇有创见，但未必即是定论。又如关于徐文化的渊源与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问题，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推敲。因此，尚望对徐国史研究有素的同志对此“小史”进行评述，以期再版时能够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面目。

阳羨蒋赞初序于金陵北山之侧

一九九〇年四月

目 录

第一章 徐族的起源	1
第一节 迁徙说和土著说	2
第二节 虎方与徐方	6
第三节 徐与东夷、淮夷的关系	12
第四节 徐与群舒	17
第二章 商周时期的徐国	23
第一节 徐与殷商的关系	24
第二节 徐与西周的关系	26
第三节 徐的国都与疆域	41
第三章 春秋时期的徐国	52
第一节 徐与齐、鲁的关系	53
第二节 徐与楚、吴的关系	60
第三节 徐在赣浙诸地的遗迹	69
第四章 璀璨夺目的徐文化	73
第一节 农业经济的发展	73
第二节 徐器的冶炼和造型	77
附录	84
1. 徐国大事简表	84
2. 有铭徐器一览表	88
后记	97

第一章 徐 族 的 起 源

在中国的先秦史上，徐国的出现和消失最富有戏剧性，它崛起得奇特，从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诗经》、《左传》、《史记》等文献乃至掺杂着神话成份的传说中，可以知道它有过显赫的历史，创造过璀璨的古代文化，是确有着特殊风俗的一个部族。徐文化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体系中，应属于源头之水的一部分。它的文化营养不仅为春秋时期的吴、越、楚所吮吸，也披及中原齐、鲁等国。即使在秦统一文字时，也可剔挑出承袭的因子。

近年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使始于三十年代就开始的古徐国的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有关古徐国的有铭徐器接连出土，无疑为研究者传送了新的内容，使研究工作得以在 firsthand 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研究文章。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和所用功力的投放程度，研究成果未能汇聚成一个古徐国的总体概貌。笔者就古徐国的研究情况，笔耕偶拾，串联成珠，在前人研究整理的基础上，经过几年探索，把这一既有收获的

喜悦、也带着破译未果的苦恼的《古徐国小史》，奉献读者，以期赐教。

第一节 迁徙说和土著说

徐族的起源，到底在哪里？历史并没有留下多少确凿的答案。有人推测它是东夷的一支，也有人说它是淮夷的别称。这些斩头去尾的研究，全因史料的或缺，谁也不去深究徐的起源问题。它不象楚，虽然起于徐之后，但中国文学的不祧之宗的桂冠获得者屈原，在他的传世名作《离骚》的一开头就自报家门说：“帝高阳之苗裔”，使楚史的研究者很容易找到了楚的始祖原来是传说中的五帝之一的颛顼^②。而徐的始祖，由于徐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得过早，不仅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文学作品，在有限的先秦典籍中，能捕捉到的信息也是少得可怜。徐的起源乃至始祖是谁？即使愿意象楚一样姑且认一个始祖，也是无从生根的事。三十年代程憬先生发表了《夷方与徐方》^③，四十年代亦有《虎方考释》问世^④，郭沫若亦在徐器铭文上多次破译^⑤。然而关于徐的起源研究进展甚微。

1984年，《安徽史学》2期载出何光岳先生的《徐族的源流与南迁》一文提出：“徐族本嬴姓，系东夷族少皞氏之支裔”，并一反历来史家只提徐在山东活动的惯例，明确提出徐的发源地为：“它在夏商时期，是发源

于嬴姓始祖的燕山一带，是由燕族最早分出来的一支部族”。作者从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地名变更中，搜寻着徐族流徙的信号。

徐族的起源，李白风先生在其《徐夷考》中则说：“徐夷居住的淮河以北、微山湖以南的徐州（铜山县）一带”^⑥，认为徐有大致不变的居住范围、文化传统。这分明是“土著说”的代表。

徐旭生则认为徐当在山东曲阜附近立国。后因鲁之胁迫，《诗·閟宫》中反映鲁派兵伐夷取得胜利告祭祖庙的情景，亦证实了鲁、徐交恶的情况。于是，徐旭生则认为，徐是从山东迁徙到淮水之滨的，主因是鲁的军事力量的压迫^⑦。这一迁徙之说，有不少学人首肯。

中国考古界的苏秉琦先生则在有关研究成果上提出了：“徐夷、淮夷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如果把山东的西南一角、河南的东北一块、安徽的淮北一块与江苏北部连接起来，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这可能与徐夷、淮夷有关。古人说：江淮河汉，谓之四渎。不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范围扩大到淮河流域来，很可能在这个地区存在着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原始文化。”^⑧按此说法，徐在苏鲁豫皖交界之地生活的历史，以这一地带所知的北辛文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龙山文化等遗存的来看，北辛文化测定为6700年至5600年前，龙山文化

则为公元前2200年至前1900年。也就是说，早在六千年前，徐淮夷就在这里栖息生活。如用古史传说时代相对应，则是在黄帝占居中原时期，徐人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发展了。

徐的起源，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以为，远古之世，部族因战争、天灾乃至地理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影响，不同族类之间，都为了各自的生存，寻找理想的居所，“夸父逐日”这一神话传说，或许就透露出了这样一个潜信息，即远古先民为了追寻理想的适身之所做出的牺牲。因而流徙和搬迁乃是先民生活的一部分。游牧与农耕也因地因时而定。以徐在春秋间有记载的历史去看，徐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苏鲁豫皖交接之地的。应为东夷的一支。

海外一部分研究太平洋历史文化的学者认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太平洋文化的发祥地。所谓东夷文化，因夷即为海，故可称之为海洋文化^⑨。以近年考古发掘中所知的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浙江马家浜遗址等东南沿海区域中用红陶钵盖脸的葬俗论之，这一推测似有根可寻。东夷文化可以这样认为，是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各部族共同创造的。徐的始祖就是东夷的始祖——太皞和少皞。太皞之遗墟在陈，即今河南省淮阳县境内，紧傍着古淮河。少皞之墟在曲阜，今仍有少皞陵供人祭奠。以殷周以来，中原与东方征战不断，明显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圈来看，生活在淮河之滨的徐

人，与东夷的祖先至少曾有过血缘的联系。少皞氏以鸟为图腾，分为若干个小支。刘毓璜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类型，当是“少皞文化”的历史遗存。这与徐所分布的地域来看，仍有吻合处。少皞嬴姓，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秦、徐、江、黄、郯、莒皆嬴姓国”。秦不知什么原因跑到西部去了，其余嬴姓诸国在春秋时期仍不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从考古资料看，以春秋时期徐人活动较多的地区为例，江苏省灌云县大伊山遗址，不仅有祭祀的痕迹，葬俗上亦有石板葬、屈肢葬、有的脸部覆着凿洞的红陶钵^⑩。仅在江苏淮阴地区，在曾为古河道的沿岸，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上百处，商周时代遗址亦有一百多处^⑪。近年发掘的江苏省沭阳县万北遗址，发现了江苏境内迄今所知的最为古老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相对年代达7000年以上^⑫。葬俗亦有用凿洞红陶钵盖脸之举。因该遗址堆积较厚，保存完好，自第四层下部至第十一自然层均为新石器时代堆积，文化系列面目清楚，即：岳石文化——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早于北辛文化的遗存。在该遗址商周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青铜器，以兵器为主，铜戈、铜矛、铜镞等^⑬。这些资料说明了徐人所生活的地区，土著势力相当强大。徐文化的发达，是有本土基础的。它很可能接受并消融了一部分外来文化，还把迁徙部族带来的各种称呼和习俗也吸收了进来。这一方面从

文化遗址不尽相同的面貌中折射出来。也可从夏商以来传世的甲骨文中有关“尸方”、“人方”、“虎方”等诸多称呼中反映出来。

即使有一支很强大的部族攻占其地，从分布在这一区域的文化遗存的内涵去分析，也是与当地的土著在频繁的交换和广泛的接触中融为一体了。

第二节 虎方与徐方

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先秦史，几乎只是几个争霸大国的国别史。而殷商之际的甲骨文字，因整理和破译的程度，还很难对一些较细小的史实予以核对。虎方与徐方的研究，前人虽做了许多工作，仍未能使之条分缕析脉络清楚，因而现仍只能述其大概，并试掺入一些新的认识，以连缀徐国的历史。

竹木易朽，金石难销。有关虎方的记载见于金文的，仍首推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在湖北孝感出土的中方鼎，其铭文为：“佳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相南国贯行，执王居在射圃贞山，中使归生对扬于王，执于宝彝。”^⑭

郭沫若在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称此鼎为周成王时礼器，并说：“虎方亦见于卜辞，此属南国，当即徐方，徐、虎一音之转。”^⑮关于虎方即徐的推测，还举了“仲𪔐”作旁证，其铭文亦有：“王令中先相

南国”，以徐在江淮一带势力正炽的地势来看，正值周都镐京以南，从方域上讲及后来一系列战事及古文献记载来分析，此推测是与当时态势吻合的。关于中方鼎的年代，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称其为周昭王时期^⑥。因而，至少可以说，周朝前期，仍承袭商制，对周围方国的称呼还未用夷狄之语，大一统的独尊观念还没有完全渗透到礼器上。也就是说，春秋时代称徐为夷为戎，是后起含有贬抑之意的称呼。徐在这之前，至少在商代，是呼之为“虎方”或“虎族”的。这或许是徐地处东南，平原千里，沼泽潭生，当时正值小冰河还暖时期，猛虎常栖其所，人虎共存，既争且斗，或畏虎敬虎，遂以虎为图腾，并以此为特征，冠之以虎族亦未可知。与之相遇相交的异部，亦可因其多虎，称之为虎方、虎族、遂相沿成习，也是情理中事。江苏淮阴博物馆在1988年2期《考古学报》上发表的《淮阴高庄战国墓》中有出土的青铜马车较首，其头为变形虎头，在同一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铜器上的线刻花纹图案，中有奔跑的马，观其腾跃的身段与扬起的尾巴，多为虎状，或许正是地处徐国中心地区图腾的遗存。以楚巴文化中畏虎敬虎，及相传的楚史《杻杙》以虎为神的习俗作参照，徐在其居住环境中，当能伏虎方能生存，方能让商周视为强项。所以虎在徐部族的图腾作用，还应有更多的范例。惜其考古资料的阙如，仍不能妄加猜测。若从太平洋文化区对应地理位置观之，

在隔岸的古代美洲，留有玛雅人的史书《通译者美洲虎》中关于美洲虎的崇拜仪式的记录^⑦，这对应时间与对应地理位置上的对虎的且敬且畏，在世界古代史上的暗合，应该说是意味深长的。亦可见有研究者视东夷文化为海洋文化之真谛。传世青铜器中，殷商之器有不少镌刻着虎形图案的礼器，如：虎簋、桎父、乙壶、父乙爵、父丙鼎、虎父丁鼎、鱼父乙鼎等。特别是见于《金文编》的鱼父乙鼎，其间潜在的信息尤为丰富：



这一图案，李白风先生释之为祭祖用的祭器^⑧。他认为：“𡩇是庙的象形字，是祭祖的，所以有屋顶。”且不管原始先民是否有庙或庙的概念，李白风认为𡩇为屋宇，笔者深表赞同。有关地理资料表明，徐活动频繁的区域，在几千年前，确为沼泽频布，气候温润，虎豹出没的环境。徐要生存，其所居若非巢居，当有河姆渡文化中的高脚楼为栖身之所。从鱼父乙鼎无意留下的图案画中，透露了确有高脚楼这一重要的信息。从摹本上看，中间一竖略短，这或许正是实际生活在画面上的透视关系所造成的。笔者以为，𡩇正是“徐”的象形，“彳”的偏旁，从鱼父乙鼎头向相反的两只虎来看，应为虎的图案逐渐线条化的符号。按“徐、虎”一声之转的规律，虎、徐由图案而演变为符号文字，仍暗示着一脉相承的联系。至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徐”为：“安行也”。已失去了本义，但

仍透露着沼泽难走，人兽缓行的原始意义。徐中舒先生对徐、余等字，考释为：“都是古代南方民族巢居的象形”。董其祥的《涂山新考》亦说为：“巢居、干阑式建筑的象形”^①。何光岳在《徐族的源流与南迁》中还认为：“余族族徽加人傍为徐，象征人在搭巢。”^②

1986年，陕西安康县出土了一件有关虎方信息的西周重器《史密簋》。其铭文大意为：周正十一月，周王命师俗、史密东征，合击南夷。南夷的两个国族卢、虎会合杞夷、舟夷，阵容整齐，全面进攻周王朝的东方领土，齐国军队获得了胜利，活捉敌酋图、宽、亚三人。师俗率齐师车兵进攻长必，史密也掌管玄族人，莱伯以及夔、尿国的军队频繁进攻长必，终于取得了俘敌虜百人的战绩。据称《史密簋》为周宣王时期的铸器^③。这是青铜器中有关“虎方”的第二次记录。联系铭文中“东征”、“殽南夷”等语，“虎方”当是居住在淮水流域无疑。以《诗·江汉》、《常武》均为周宣王伐“淮夷”“徐方”证之，当是周宣王时对徐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征伐。而《史密簋》中所述的“虎方”以“虎、楚、徐、郅”亦同音异转之字^④论之，“虎方”当即徐的别称。而其时的徐国气势方炽，阵容强大以至于全面进攻周的东土。而周王朝忙于调兵遣将并集结了齐师、莱伯和夔、尿等国的军队，才攻下了这“虎方”占领的长必之地。

在青铜器方面，刘敦愿先生怀疑似为与虎方有关

的，有湖南宁乡出的虎吞人卣，安徽阜阳出土的龙虎尊等殷商之器^③。

安徽嘉山县 1953 年发现的一组殷商时期的觚、爵、斚、壘，1957 年在阜南发现的觚、爵、斚、尊等，也疑为是与徐方亦即商人称之为“虎方”有关的遗物^④。

郭老早在《史密簠》发现之前就已推论：“虎方亦见卜辞，此属南国，当在江淮流域，疑即徐方。”以周人攻徐的路线为自成周至今河南巩县左近再至今河南上蔡县再至今安徽阜阳一带来看^⑤，其所伐的“虎方”即春秋之际徐国的所在地。虎方即徐方似已论定。

虎方的称呼，如果说在现存金文中仅见此两例的话，而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则屡有所见，试举例如下：

□贞：令望乘眾與𩇑虎方？十一月

□與其𩇑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其𩇑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其𩇑虎方，告于丁？十月

以上均见于王襄的《簠室殷契徵文·帝系》。按于省吾说，𩇑即途。途读为屠，屠戮，与讨伐之义近。此片卜问是否命令派兵讨伐虎方，为此而祷告于大甲、祖丁、祖乙三个先王。在《夷方与徐方》中，程憬则称“𩇑”字从“止”，“徐”字从“彳”，《说文解字》：“彳，小步也，象人胫，三属相连也”，本义当“足”讲。而“止”亦训作“足”。《汉书·刑法志》：“当斩左止”，颜师古即曰：“足也”。“𩇑”通“徐”，卜辞中则应释“𩇑”为徐人或

徐方。“缶虎方”连举，若释之为“屠”，似商人还不会直率到如此可爱的地步。发兵远征，胜负难料，方求告先祖，至于其间的微言大义，似仍待新解。总之，有商一朝，远在东南的虎方，已成了商代的心病，若非力量的强大，不至于商王三番五次祈祷于先祖灵前的。在这求卦问卜的甲骨中，有关虎方即徐方的记载还见于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前编》（卷七十八页）：

乙丑卜，王贞：余代猷。

己酉王卜，贞：余征三𡗗方，鬯，嬖命邑，弗敏，不匕匕彝，在大邑商，王曰，曰大吉，在九月，遣用求五牛。丁丑王卜，贞：今日𠄎九𠄎册焚𠄎戾弓口丈众二𠄎余其从战亡有自下上□□□有不曾伐□□因邑商亡它在□□。

有关徐方的记载，在甲骨文中还可觅见，因语义不详，大概可知，徐之迫近商都即迁殷之前的今河南商邱地，若与后来活跃于淮浦之间联系来分析，从地理上来说，只不过是进退之间的事罢了。因此，殷商之际的徐方、虎方，乃为春秋时期的徐夷之祖先，应是无可疑义的事。

若从考古资料看，殷商之际对东南一带的影响，在出土铜器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耳尊、罍及兽面纹鬲等，都是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商文化影响的珍品。而商周之际的文化交流，往往不是自觉自愿，而是以流血的战争强加给对方的。文化的

互渗，几乎都有血与火的洗礼。

古文献中，《左传》中有一段话，似对虎方的研究亦有帮助，哀公四年（公元前517年），正值徐国岌岌可危之际，载文有：“楚人即克夷虎，乃谋北方。”东夷的虎方，或可缩称为：“夷虎”，也可释为夷地的虎族、虎方。楚与徐，有人疑其曾有血缘上的联系，至少在楚争霸的过程中曾有过结盟的旧谊，不称徐而变称其为“夷虎”，或含战术上重视这也曾显赫过一时的敌手也未可知。虽然不几年后，徐亡于吴，但其时吴楚相斗，都是为了打通北上争霸的环节，这一点是共通的，“乃谋北方”也就找到了注脚。只不过是吴抢在楚前，把“即克”变成了事实而已。这一个小插曲，或许是作为虎方之称的徐人，在史载上的最后一个余音了。至于徐在历史风云中的表演，殷商之际仅是一个信号，作为一个崛起的部族，使商人不得不刮目相看，并时时为克击虎方、徐方占卜求卦，屡见于卜辞了。

第三节 徐与东夷、淮夷的关系

关于“夷”的称呼，应该是周氏族进居中原以后的事。周以落后的文化，凭借着坚韧与强悍，入主中原取代了商人的地位后，很注意在各方面修饰自己，他们一方面贪婪地吮吸先进的文化，同时又用威慑与抚慰的文武两手处理与各部族的关系，遂有了西戎、北